

整体疆域观下中国边疆的意蕴探讨

刘清涛¹

【摘要】：从中国整体疆域来看，中国边疆—内地的分布格局从根本上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造成的人口及其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不均匀、不对称分布，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造成人口及其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相对减少是边疆的本质属性。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稳定性，中国整体疆域内边疆—内地分布格局长时期保持相对稳定。今日边疆的景象与历史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限制与科技进步带来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历史)整体疆域观 中国边疆 本质属性 自然地理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 (2022) 02-0159-08

回顾近年来建构中国边疆学的讨论热潮，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学界对何为边疆或说边疆的本质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一些视角和观点的分歧，使得边疆学建构呈现不同的发展方向，反映了中国学界对边疆问题和边疆学学科建设思考的方兴未艾之势，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不断推进。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尝试从整体疆域观的视角，对中国边疆的本质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观察中国边疆增添一个视角，一些看法难免粗疏，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近年来学界有关边疆本质属性的讨论

近年有关边疆本质、边疆概念及定义的探讨，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边疆“建构论”和“实在论”之争。近年有关边疆本质的探讨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边疆“建构论”和“实在论”的论争。建构论者强调政权对边疆的界定，包含了政权对某一边疆地带的认知、统治目的、所能使用的统治手段资源等主观因素。建构论者并非不承认边疆地区的客观条件，而是强调主客观结合。如周平教授认为：“国家是否把边缘性地带分为边疆，如何进行边疆建构，如何治理边疆，主要取决于国家治理的需要”，“边疆不是纯客观的产物，而是主客观的产物和结果。”

从主观方面来看，是否是边疆取决于统治者对疆域边缘的认知；从客观方面来看，这些边缘区域与核心统治区有着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当统治者把这些区域看作异质性区域时，就形成了国家的边疆”。¹吴楚克教授认为：“边疆的本质是指人们活动的特定区域，这个区域被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机构认定为远离中心区域，并行使有效的管理。边疆的根本特征是变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边疆始终在变动当中，不变的是边疆始终指边缘区域。”²总之，边疆建构论最基本的特征，是强调政权为治理的目的而对“边疆区域”的界定，多属于政治学的视角。如有学者进一步称，“新边疆观认为边疆就是国家治理中国国家权力存在管控风险的边缘性区域或领域”。³

杨明洪教授针对建构说提出了边疆实在论，认为“在‘王朝国家’的国家形态下，边疆是建构起来的，而在民族国家这样的国家形态下，边疆是无法建构的，至少作为地理边疆是无法建构的”；在现代国家内一个地区为边疆地区乃是其相关属性和功能决定的。⁴边疆建构论和实在论的“对立”引发了很多学者的探讨，一些学者在各方讨论基础上做折中或超越。⁵

二是“一般边疆学”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探讨方向是以孙勇教授为代表提出的“一般边疆学”的问题。“一般边疆学”认为边疆是人类从部落到现代国家，在领地和疆域划分中一直存在的现象。边疆现象根植于人群的生存本能，从远古时期的部落

作者简介：刘清涛，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编审，主要从事中国边疆史和疆域理论研究。

领地划分，到今天的太空、网络空间的竞争，都反映了群体及其构成的国家间势力范围划分中的介入与反介入、认定与反认定、扩张与收缩、整固与分离等活动的“边疆”博弈。由此，探讨“边疆”博弈的具体内容，再应用于维护边疆的利益与加强边疆治理等。⁶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边疆研究思路。

三是基于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的中国边疆学构建的探讨。以中国边疆历史发展为基础，结合今天边疆治理、发展的需求，探讨中国边疆的内涵，强调中国边疆学不脱离中国国家这一特定背景，围绕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边疆这一特定对象构建中国边疆学。这是有着历史学研究背景，同时关注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问题的多数学者对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一般主张。⁷

四是从民族文化等角度探讨边疆的本质属性。一些学者从民族文化角度观察中国边疆，认为中国边疆本质特点在于民族等因素。这一观点与民国时期一些学人强调文化差异是决定一地构成边疆的重要因素相类似。⁸

上述探讨，也激发笔者尝试对中国边疆本质问题做些思考。而中国学界有关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问题的探讨观点，可为观察中国边疆的构成与分布以及探讨其本质问题带来启发。

二、整体疆域观与整体边疆观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的大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该讨论又继续进行。从20世纪90年代到进入21世纪以后，相关探讨逐渐减少。参与讨论的学者包括白寿彝、范文澜、翦伯赞、刘大年、孙祚民、方国瑜、何兹全、翁独健、谭其骧、杨建新、周伟洲等，讨论的根本问题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是仅指中原王朝政权及其范围，还是包含了中原王朝和周边各民族政权及其共同范围。由此形成两种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的方式，一种是以今天或某一时期的国土范围为框架，以此上溯去框定整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范围，另一种则强调中国疆域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只能以当时的皇朝统治范围来确定。⁹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中，多数学者都赞同历史上的中国不能以各个中原王朝范围来界定。如方国瑜先生指出，“王朝的疆域，并不等于中国的疆域”，如果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国土范围，强调变更伸缩，“将某些地区的历史，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内，有时在中国历史之外，岂不把这些地区的历史斩断，如何能作系统的阐述呢”，“总之，中国历史，既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就应该包括他们的全体历史，不能‘变更伸缩’”。¹⁰

谭其骧先生的主张影响较大。他指出：“新中国的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谭其骧先生认为，这样一个范围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并能反映近代失去的领土。¹¹

这场讨论虽然没有明确的结论，但笔者认为，讨论“声渐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今天的学者们，都不会狭隘地以历史上各个中原王朝及其范围为中国，而将某具体王朝范围之外的中国一些边疆地区视为当时的中国之外。方国瑜先生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该“整体性”包含了“内地与边疆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¹²。亦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¹³。这样整体性看待历史中国疆域的原则，可称之为历史整体疆域观，或简称整体疆域观。

这样一个整体疆域包括边疆与内地，这就可以给观察和研究边疆带来不一样的视角——即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视野也不

能再以具体王朝经略范围为局限，而是从整体疆域内边疆—内地分布格局中关照整体的边疆范围，并由此观察边疆与内地分野的本质问题。

三、整体疆域内边疆—内地分野的形成、分布及其决定因素

有了整体疆域观，就要看整体疆域内边疆—内地格局是如何形成与分布的，以及造成这种分布格局的根本因素。

边疆是与内地同构的词语，边疆一词的使用语境常常是基于一个政治单元，指的是政治单元的边缘地区。先秦文献中就有“边疆”一词见于使用，指的是封国边界地区。秦汉一统后，“边疆”一词不见用，但“边徼”“边境”“边地”等词语见于使用，显然指的是所辖与中原相对的边缘地区。¹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原内地及其文化认同的形成和巩固，边疆一词溢出了单一政治单元的定义，逐渐指已经形成文化和国度认同的中原内地的周边地区。

在分裂割据时期“边疆”一词的使用，有时仍然是基于一个政治单元的政权所辖边缘地区为指向¹⁵；有时不再以一个政治单元为限，特别是割据性地方政权，因为互不承认正统性，其所谓的边疆不以己方所辖为限，而是指与中原内地相对的边疆区域而言。如《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言：“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¹⁶。

这里“边疆”一词的所指，显然不是以政权辖境为限，而是与中原相对。到唐朝，边疆一词多见使用，所指地方不一，常指王朝需要戍守的边远地方。到宋代，几个王朝的对峙情形又出现，宋人使用“边疆”一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上述两种情形。从现实政治及行政层面而言，宋朝将控制的疆域边缘地区分为极边、次边¹⁷；从国度和文化认同的角度而言，宋人并不局限于其统治地区来看边疆，而是基于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形成以中原内地为核心的宋人的“历史中国”范围，具体说是前朝历代有过经略或设置的地区为限¹⁸，边疆当然就是这一区域的外缘了。如宋人范仲淹诗中“燕然未勒归无计”等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中国的边疆情怀。

可以说，此时作为整体中国疆域核心的“中国”——中原内地，以及内地—边疆分野已有了稳固的形态和认知，只是边疆地区外围所包含的具体范围还有待于多民族共同参与整合与巩固。元朝由蒙古入主中原，建立起空前大一统的王朝，特别是将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管辖，最终实现了整体疆域的巩固统一。明朝虽然立足中原，但对包括了东北、北方以及今天新疆、西藏在内的整体边疆都有经略。清朝由满族入主中原，到乾隆中期实现大一统，使得中国整体疆域范围巩固下来。因此，中国整体疆域是多民族共同参与构建的，也是一个历史自然发展演变的过程，并非受制于具体政权的建构。

当人们谈论边疆时，常常限制于一个政治单元内加以探讨和定义。如有学者言，“国家的存在是边疆存在的前提，国家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结合就形成‘领土’，原先的‘自然空间’就转化为‘政治空间’，有限的国家权力所及最远的空间边界，也就是国家权力的‘强弩之末’就是‘边疆’”；“由此可见，‘边疆’为国家建构的产物”¹⁹。

确实，如在一个政治单元内看边疆，在自然发展状态下，边疆就是该政权统治中心区外围需要控御的空间，此空间并非无限延展，也非围绕中心地区周围均匀分布，其范围受制于自然地理因素限制，同时又受制于政权自身力量投射能力和外来威胁的现实性及程度。然而，回到中国整体疆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看，在历史长河中，一个以中原内地为核心的中国国度与文化认同的形成，使得边疆的概念早已经溢出了具体王朝政权统辖的限制，边疆—内地分布格局是历代多民族参与构建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结果。

在多民族共同参与构筑中国整体疆域的过程中，决定边疆—内地分布格局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历朝皆拓边，但却反反复复，边疆还是边疆，内地还是内地，最终边疆—内地分野似乎固定在那里。因此，决定边疆—内地分野的只能是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适合于农耕的自然地理环境构成了人口密集、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内地，其周边便是边疆地区，伴随着的是农耕与人口

密度减少和各族民众适应当地自然地理环境形成的各种游牧、农牧相间等生产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在各族建立王朝共同构筑中国整体疆域的长期历史过程中，这种人口与发展的不对称分布，自然就形成了内地与边疆的分野。由于各地自然地理环境的稳定性，中国边疆与内地分布格局长时期都是稳定的。

那么中国整体疆域内边疆和内地分布格局是什么样的呢？也即哪些地方是边疆？可以清乾隆时期为例，从当时官方文献对“边疆”“内地”的词语使用中略见一斑。《清高宗实录》被称为边疆的地区。

清乾隆时期官方使用“边疆”一词所指的范围，反映了整体疆域内的边疆—内地分布格局。需要指出的是，乾隆时期统一了新疆，清朝统治疆域前后有变化，且乾隆皇帝有言“甘省各营伍官职较他省独多，原为地属边疆起见。今准噶尔回部荡平，屯田驻兵，自伊犁以达叶尔羌，向日之边陲又成内地”，但这种“边陲转内地”只是一种比拟，并没有改变中国整体疆域内边疆—内地原本分野。如，更有“查乌鲁木齐等处，较伊犁、回部更成内地”²⁰，“现在伊犁等处，俱成内地”²¹等语，不能仅从字面上认为这些边疆地区都成为内地了。因此，乾隆早期被认为边疆的如甘肃一些地方，并不会随着统一新疆，而变成内地，其仍是与内地相对的边疆。

唯有因为自元明开始，由倭寇造成的海上威胁渐浮现出来，继之西方殖民势力到来，海上秩序维护使沿海地带从自然地理空间转变为王朝防御空间——海疆²²。所以，清乾隆时期，海疆呈现的是覆盖从东北直到广东的所有沿海地带及岛屿。虽然如台湾岛等也有自然地理环境原因造成人烟稀少、开发较迟而构成与内地相对的边疆，但总体上海疆地带的形成是出于安全防御管控。所以海疆的本质可以看作是政权因安全防卫需要而建构的控御空间，这点与陆疆不同——陆疆虽然同是需要防御的空间，但有造成其分布格局的更加本质的原因，即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人口及其实践活动的相对减少。

因此，在整体历史疆域观下，从根本上看是自然地理环境差异造成的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在不同地区的不均匀或不对称分布形成了内地和边疆，人口和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相对聚集的地区是内地，反之是边疆。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造成人口及其实践活动相对较少而使一地成为与内地相应的边疆，是包括地形、气候、区位等在内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谈边疆的本质属性，或说对边疆定义，应采取最化约的方式，这样也可以透过民族文化等衍生性因素，只看最本质的因素。如有学者指出，“‘边疆属性’与‘边疆性’是有重要区别的，‘边疆属性’是指边疆的本质，而‘边疆性’则是边疆的特征”²³。可以说，历史上边疆和非汉民族的地域经常“重合”（非绝对，很多边疆地区自古也是包含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地区），属于“边疆性”，即观察到的边疆特征之一。

这是构成边疆的衍生性特征，非本质特征，是不同民族群体以各自生产生活方式适应边疆各地自然环境的结果。但民族分布及其文化不能作为边疆构成的本质因素，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有些边疆地区民族文化因素淡化了，但其边疆属性没有改变，仍是边疆，比如今天的东北边疆地区，甚至西南边疆地区，人们说这些地方是边疆，往往不是基于这里有多少异样的民族文化。如果以民族及文化的差异来定义边疆，恰恰遮掩了边疆之所以为边疆的根本因素。

总之，从长时段的中国整体疆域观出发，就疆域分为边疆—内地两部分而言，来探讨边疆—内地分野的形成及其根本原因，就会得知是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作用于人实践活动的分布结果，造成了边疆和内地之分。这是边疆的本质所在。

四、今日之中国边疆

当王朝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之后，也即进入主权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体系之后，边界开始成为相邻国家之间明确的法定界限，界限之内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边疆的定义从王朝状态下单向度地以内地之周边区域来界定，变成还要加上与邻国交界的角度来界定。再加之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因素，这就给定义中国边疆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

民国政学人士发现，边疆的定义是复杂的，如不同时从几个方面定义，就很难定义边疆。²⁴然而民国时期被视为边疆的地方，与上文所举清代中期大体一致（当然外围失去的领土除外），如东北、内外蒙古、热河、绥远、察哈尔、宁夏、甘肃、新疆、西藏、青海、西康、云南、广西等。²⁵可以说，决定边疆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没有变化，也就决定了边疆一内地格局没有变化。民国政学人士之所以感觉边疆定义困难，恰恰是忽略了边疆的本质——自然地理环境造成人口及其实践活动的相对减少，而被边界、民族、文化等特征因素所遮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整合。边疆一词通常只用于邻国界的沿边省份，但在国家涉及内地派出的支援计划时，所使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一词仍是覆盖了邻界沿边省份和非邻国界的川西、青海、宁夏等地²⁶，也即前文所述从清朝到民国一直视为边疆的地区（周边失去领土除外）。可见，尽管新中国疆域整合和国家整体发展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但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差异造成的内地一边疆分野仍是持续的。虽然一些靠近内地边缘的如青海等地，因为不临边界，一般不再使用边疆一词指称，但相对于内地的那种“边疆意象”仍是显著的。²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四十余年的发展，使得中国边疆地区同内地一道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边疆地区的人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实现了小康目标。新时代以来，总书记和中央还给各边疆地区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赋予了新的发展定位，使得边疆省份各自呈现独具特色的发展景象。如新疆要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云南要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内蒙古要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中国今日边疆不再是一番落后的景象，而成为各自独具特色的发展区域。有学者指出，“有些区域曾经被认定为边疆，但随着这些区域在其发展过程中，其异质性和差异性逐步消失，与国家的其他区域的同质性程度提高，这些区域就失去了原有的边疆区域所固有的特殊性，在发展过程中就不再被看作边疆”²⁸。此言是正确的，但由于决定中国边疆一内地格局的是自然地理条件差异，这一因素在历史上无法改变，在今天仍是难以克服，这就决定了中国很难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整个国土“同质性”程度很高，没有了边疆。²⁹所以，可以想见，中国边疆地区一方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自己的发展特色和定位，另一方面并不能整体上改变边疆地区受制于自然地理条件而呈现的与内地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不相称的边疆属性或“边疆意象”。唯一改变的就是边疆不再是贫穷、落后、荒凉的景象，而成为独具特色的发展区域。

五、结语

整体疆域观下看，自然地理环境差异是构成中国边疆一内地分布格局的根本因素。但有几点需要指出：

首先，整体疆域观下看待历史时期的边疆不必再受制于具体王朝的边疆伸缩，并不是要否定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忽视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略。内地有相对适合农耕定居的自然条件，与边疆相比，人口集中，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同。所谓“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³⁰，在历史长河中将此话放置其他边疆地区，也应是大致合适的。因此从整个历史过程看，中原作为整体疆域的中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其对边疆地区的吸附力是贯穿始终的，不仅体现在自古以来中原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也体现在边疆民族如河流汇入湖海一样不断融入中原民族的现象中。在整个历史上，中原地区及中原王朝在中国整体疆域构筑中发挥的是核心凝聚作用。虽然有时候边疆民族入住中原，建立大一统王朝——此对中国整体疆域的统一和巩固非常关键，但其建立王朝后依然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来经略包括边疆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家。

其次，整体疆域观下更需要注意研究的是自古以来边疆与内地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及边疆与内地如何整合在一起构成国家疆域的过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以及疆域构筑与巩固过程中，既要注重中原地区的凝聚作用，也要注重边疆地区对国家统一和疆域整合发挥的重要作用，更要探讨疆域统一与巩固的机理。

再次，强调边疆的本质属性在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造成一地人口及其实践活动的相对减少，这并不是说边疆地区没有或者应当忽略其他属性，如临界属性、民族与文化属性。中国边疆地区，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需要加强研究。本文希望提供一个观察边疆的角度，并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边疆的认识和推动边疆研究的开展。

最后，要注重中国边疆的发展变化，注重决定边疆无法改变自身地位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限制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今日边疆已经不同于历史时期的边疆，边疆不再与落后、荒凉的景象相关联，而呈现的是能够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独具地方发展特色的新的边疆景象。

注释：

1 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8、430页。

2 吴楚克、马欣：《解构边疆观与重构边疆学》，《思想战线》2018年第2期。

3(1)方盛举：《新边疆观：政治学的视角》，《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4(2)杨明洪：《反“边疆建构论”：一个关于“边疆实在论”的理论解说》，《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5(3)参见朱金春：《边疆研究的本体论转向——“边疆实在论”与“边疆建构论”之争鸣再讨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朱碧波：《中国边疆学：学术争鸣的回顾与学科发展的前瞻——基于“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引发的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6(4)参见孙勇、王春焕、朱金春：《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孙勇、王春焕：《时空统一下国家边疆现象的发生及其认识——兼议“边疆建构论”与“边疆实在论”争鸣》，《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5期。

7(5)自20世纪90年代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之后，近年来相关探讨有马大正：《关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学术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再思考——“三大体系”建设之我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1期；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邢广程：《开拓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李国强：《开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新征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李大龙：《试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2期；张云：《中国边疆研究的内涵和特征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多学科合作》，《中国边疆学》第1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等等。

8(6)参见姚大力：《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9(1)参见刘清涛：《60年来中国历史疆域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

10(2)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方国瑜文集》（第1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原文载《学术研

究》1963年第9期。

11(3)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

12(4)潘先林、张黎波：《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主要现象及其与国家安全之关系》，《思想战线》2011年第2期。相关论述另参见潘先林、谭世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思想战线》2019年第2期。

13(5)胡阿祥：《何谓历史？何谓中国？》，《新世纪图书馆》2012年第8期。

14(6)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

15(1)如《魏书》卷47《卢玄列传》载：“诏昶曰：‘彭宋地接边疆，势连淮海，威御之术，功在不易。胸山险塞，寇之要防，水陆交凑，扬、郁路冲，畜聚凶徒，虔刘边鄙，青、光、齐、衮每罹其患。’”

16(2)《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

17(3)参见杜芝明、黎小龙：《极边、次边与宋朝边疆思想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2期。

18(4)参见李伟：《披图则思祖宗疆土：北宋的化外州与历史中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1年第2期。

19(5)何明：《边疆特征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1)《清高宗实录》卷650，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甲戌。

21(2)《清高宗实录》卷771，乾隆三十一年十月丙寅。

22(3)刘清涛：《南宋至明初的海防与海权论析》，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二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3(4)杨明洪：《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24(1)参见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孙宏年：《认知与实践：20世纪20~40年代“边疆”理念及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25(2)参见李大龙：《“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汪洪亮：《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边政”含义的认识》。

26(3)《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定》（1958年8月29日）文件中，从内地动员青年前往的目的地有内蒙古、青海、甘南、新疆、宁夏、川西、东北三省、海南和南路（当时广东省下一个专区），参见《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〇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983年2月统战部和国家民委“智力支边”项目中“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包含了“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贵州、云南、吉林、黑龙江、辽宁等省区”，参见：《把知识送到边疆去》，《人民日报》1983年3月29日。

27(4)《中国国家地理》2016年“青海专辑”的封面标题就是《对边疆，它像内地；对内地，它像边疆》。

28(5)周平：《中国边疆政治学》，第428页。

29(1)参见马大正：《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马大正先生访谈录》，《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30(2)《史记》卷110《匈奴传》。